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1.01.008

创知与致用

——民国时期边政学派学术活动述评

田雪枫^{1,2}

(1.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民族学研究院, 河北 秦皇岛 066004; 2. 旁遮普大学 人文与艺术学院, 旁遮普 拉合尔 54590)

摘要: 边政学是民国时期迅速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 其间有大量知名学者参与边政学的学术研究, 为推动其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遂使边政学研究成为著名的边政学派。与当时的国家命运相伴相依, 边政学之学术研究不仅有创知的紧迫感, 还有致用的目的性, 因此与我国传统学术研究的“纯洁性”规范存在一些差异。考察边政学派之创知与致用成果, 能深刻理解彼时学人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相融合的浪漫情怀, 也能探察其致力于“西学”中国化的良苦用心。边政派学人走出“书阁”、注重田野调查的学术实践, 体现出积极的入世态度和实干精神, 对当今的人文社科研究不乏启示意义。

关键词: 民国时期; 边政学派; 创知致用; 国家命运; 田野调查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1)01-0059-10

引用格式: 田雪枫. 创知与致用: 民国时期边政学派学术活动述评[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6(1): 59-68.

Cre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Knowledge: A Review of Academic Activities of the School of Frontier Studie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IAN Xuefeng^{1,2}

(1. Institute of Ethnology,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at Qinhuangdao, Qinhuangdao Hebei 066004, China;
2. Faculty of Arts and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the Punjab, Lahore Punjab 54590, Pakistan)

Abstract: Frontier studies is a discipline that developed rapidly in the era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During this era, a large number of Chinese eminent scholars participated in the academic researches of Frontier studies and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its development, thus making the Frontier studies become a famous school. Along with the fate of the country at that time, the researches of Frontier studies not only had a sense of urgency to create knowledge, but also had the purpose of application. Therefore, it produced some gaps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academic researches because of the “purity” standard. To study the achievements in knowledge cre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school of frontier studies can help us to understand the romantic feelings of the

收稿日期: 2020-12-05

基金项目: 为落实教育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文件(教外[2016]46号)而实施的中巴联合学位高层次人才培养项目

作者简介: 田雪枫(1992—), 男, 湖南长沙人, 旁遮普大学-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联合学位项目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史、教育史。

Chinese scholars who combined their personal destiny with the national destiny, and to explore their intentions of devoting themselves to sinicize the “western learning”. The academic practice of the scholars of the frontier school, who went out of the “armchair” and focused on the fieldwork studies with the positive attitude or spirit which was secular and practical, has also enlightened the research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contemporary era.

Keywords: era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School of Frontier Studies; cre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knowledge; fate of the nation; fieldwork

边政学派,根据汉语释义,“学派”的含义为“同一门类系统的知识中,由于见解等不同而形成的派别”,“边政”,是对主要或兼职从事研究边政学的专家与学者及其全部成果所构成的专门的知识派别之界定。而“边政”的含义,杨成志认为“所谓边疆政治者,就是管理边疆一切边民的事”^[1]。吴文藻定义为“边政有广狭二义之不同”,“边疆政治,系边政之广义”,“边疆行政,系边政之狭义”,“至于边疆政策,乃是根据边疆政治原理推演出来的”^{[2]266}。边政学的研究领域,涵盖的范围大,因此其“边政”指的是广义的“边政”。“边政”中“边疆”的定义,并非狭义上的地理边疆,还有“文化上的边疆,乃是就国内若干在语言、文字、宗教、风俗习惯与生活方式不同于汉人之宗族而言……而以其与汉文化有别”^[3]。换言之,在边政学的相关研究中,“边政”中“边疆”指的是地理与文化意义上的广义之“边疆”。

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的边政学,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受到重视,甚至一度成为国家高等教育系统中的一门学科,其丰富的成果不仅滋养了后来的学术研究,也为未来各相关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与实践提供了发展理念。

一 致用导向的边政学缘起

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的统治之后,中华民国于1912年在南京召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以南京为首都,并组建参议院与行政各部。1928年国民党北伐成功后,南京成为中华民国实质上的政治中心,但与此同时,内部纷争造成国力虚弱。日本在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后,全面控制整个东北。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南京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于1938年建立重庆临时政府。

随着政治中心迁往西南地区,加之日军全面侵占东北、华北,清华、北大等众多大学纷纷西迁以躲避战火,东北、华北与沿海地区的大批专家学者也都随着国民政府与大学的西迁而行。在不断严峻的国防形势与救亡图存背景下,各界人士对国家边疆地区的研究产生了空前的热情,“和其他学科的研究恰然相反,呈现一种空前的热烈与紧张”^[4]。大量边疆研究活动开始涌现,例如关于蒙藏、东北等边疆地区的研究,以及对作为新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的西南地区的研究。

“边政”作为一个新概念的提出,始于20世纪初,而“边疆”研究之精神,最早可追溯至《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訖于四海。”在现代意义的边政学形成之前,明代一些研究中频繁出现“边政”一词,并出现了一些研究“边政”的专著,如《边政考》《引边政考》《威茂边政考》,但对“边政”的界定及其研究内容仍源于“夷夏之防”的古代边疆与古代治边的思想^[5]。清代中后期曾有过大量的边疆调查,令“边疆研究”一时间由“隐”入“显”。以学者型官员严如煜为例,他就曾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著有《三省边防备览》《苗防备览》《洋防辑要》等。但清代的边疆研究大多集中在军事、地理与历史方面,很少涉及民族、宗教与社会,至于自然科学,则是无人问津^{[6]205}。清代的“边疆”概念,仍非现代意义的国家边界,而边疆研究的注重点,也大多是中央与地方、主流与边缘、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界限研究。

辛亥革命后,传统意义上的边疆研究开始衰亡,取而代之的是具有现代科学色彩的边政学。若追溯其起源,“边疆研究”实质上是其精神内核发展的第二次高潮。与清代的边疆研究相比,

民国初年兴起的边政学不仅使用了现代的科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也有很大的变化，学术活动也更加规范。吴文藻在《边政学发凡》一文中指出，边政学的研究不仅要使用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史地学等“理论社会科学”的方法，还需使用公共管理学、工商管理学、教育管理学等“应用社会科学”的方法^{[2]278-281}；与此同时，柯象峰、张少微、李景汉等学者也提倡使用问卷、图表、测验、个例调查、量度等现代科学调查方法。

在“五族共和”观念影响下，学者们也逐渐转变了“中心—边缘”的观念。随着南京政府的西迁，晚清以来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似乎开始变化，与之相关的话语也从“乱”“叛”等转为较平和的“绥靖”（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行辕以下设立绥靖公署与绥靖区，主理地方军事事务，也监管一般行政事务）。而内容上，不仅涌现大量的社会学、民族学、政治学等人文学科成果，地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也成为研究的内容，“切实研究边地之地理形势，社会状况，天产富源，外人势力，政治现象及其他与边地有关之各种重要问题……”^[7]成为共识。

无论是清代中后期兴起的边疆研究，还是民国时期火热一时的边政学，都与国家内部或外部的稳定问题相关联。清代中后期不断涌现的农民起义与世界列强的入侵，民国时期的地方离心主义与抗日战争的爆发，都关乎国家的存亡，引发政府对“地理边疆”与“文化边疆”问题的高度重视。专家学者们或是自发，或是受政府委派，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工作，不仅为国家治理提供了参考，也为后来的研究留下了宝贵材料。鸦片战争以来，西方人携带着近代殖民体系，对中国边疆地区进行不断的侵蚀与挑拨，也迫使当时的政府以及学者们以“边缘”为主题进行相关的工作。1944年，民国教育部依据《推行边疆教育方案》，指令中央大学和西北大学创设边政学系，该系师生享受师范生同等待遇^[8]。在高等教育体系中设置专门的学科，可见民国政府对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发展给予了相当的重视。

从边政学的起源与发展过程看，其每一次阶段性发展，都伴随着国家安全问题的凸显。清代中后期，国家开始逐步转型为近代主权国家，古代

传统的“夷夏之防”被近代国界概念取代。从19世纪80年代始，中国周边各大“藩属国”被全部“拔除”，不仅传统的朝贡体系受到剧烈冲击，国防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在这一背景下，学界开始重视国家边疆研究。姚文栋勘察滇缅边界，著有《云南勘界筹边记》；胡适的父亲胡传也曾对东北历史地理做过实地考察，著有《中俄分界牌》《吉林防务》《辽海榷盐议》^{[6]205}。民国初年，尽管形式上已经完成了国家统一，但在地方离心主义与外敌入侵的共同作用下，国家临严峻的生存问题。19世纪20至40年代，边政学的发展得到了国家层面的认可，不仅涌现众多调查团，还出版了《边政公论》《西南边疆》《边疆人文》等数十种专门刊载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深入西部边疆民族地区搜集调查政治、经济、历史、风俗、宗教、语言等状况报告的刊物^[9]。高等学校中也一度设置边政学系。由于边政学的勃兴及其在当时学术研究中的显要，有学者称那一时期是“边政学时代”^[10]。

无论是民国时期的边政学，还是清代中后期的边疆研究，这两次学术发展的高潮都伴随国家内、外部安全问题的凸显。民国时期，严格意义上的边政学学术体系确立，西方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系统学科知识进入中国只是其中的影响因素之一。辛亥革命后，国家不能完全掌控边疆地区，外国在华势力的存在引发政界与学界对边疆问题的高度重视；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日本侵华战争，令举国上下震惊，救亡图存意识，成为边政学勃兴的内部推力。因此，边政学的缘起，从外部看，是西方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本土化过程的产物；从内部看，则是由致用以图存意识而催生的，也可以说边政学就是为“解决问题”而发展壮大的。当国家的安全稳定问题解决后，边政学自然又会由“显”入“隐”。正如李绍明所说，“抗战胜利以后，大家就不提边政了。那时各个学科就各归各位了，就是人类学归人类学了，民族学就归民族学了。”^[11]

二 创知过程中的边政学发展

从前期的理论铺垫，到中期的系统化，再到后期学科化，边政学在20世纪20—40年代经历了跨越式的发展。彼时，来自西方的现代科学理论

体系首次整体、系统地被国内学界吸收利用,因此,大量的知识创新发生在边政学的研究过程中。同时,民国时期的边政学,在清代中后期边疆研究的基础上,也生成了很多新的观点、理论,可以说,边政学的发展伴随着知识的更新和理论的创新。

(一)学者创知

在边政学的发展过程中,杨成志与吴文藻二位学者作出的巨大贡献,是当今学术界广泛认可的,杨成志的《边政研究导论——十个应先认识的基本名词与意义》与吴文藻的《边政学发凡》,被认为是边政学作为学科成立的理论宣言^{[6][206]}。杨先生1928年受国民政府的委派考察凉山彝族,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成功进入大小凉山、探访凉山彝族的民族学家^[12],并撰写了《从西南民族说到独立罗罗》《罗罗歌谣集》等重要作品^[13];吴文藻先生则在1940年前往重庆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工作,对边疆民族的宗教和教育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14]。

杨成志先生单枪匹马独闯大小凉山,进入了被称为“禁区”的“独立罗罗”——彝族人民聚落。杨先生具有多学科的专业背景,“民俗民族人类学,三业互通相辅而成”(源自杨成志自述诗《我走过的路》),再加之其崇尚田野调查精神,其终于创立了“杨氏”本土色彩的边政学理论。他曾经说过:“我用的理论和方法不是法国式的,不是德国式的,也不是英国或苏联式的,尽管这些国家我都去学习过,我用的是综合式的。”^[15]《边政研究导论》对于“边政学”“成学”的理论探讨,就是杨先生“综合式”理念的体现。

吴文藻从美国归来后,在1941年就其研究任国民政府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参事,还兼任蒙藏委员会的顾问。怀着强烈的爱国情怀,吴先生借鉴功能学派的观点,在《边政学发凡》中提出“以人类学观点为主,政治学观点为辅”的中国化构想。在此基础上,边政学成为吴先生中国化构想的重要载体。更为可贵的是,吴先生不仅学术造诣高深,他还专注于人才的培养,费孝通、林耀华、黄迪与瞿同祖都出自他门下,他为未来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人才的培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奠定了这些学科发展壮大的基础。

顾颉刚先生在20世纪30—40年代“国破山河在”的危亡关头,将研究的重心转向边政学。“年

来的内忧外患为中国有史以来所未有,到处看见的都是亡国灭种的现象,如果有丝毫的同情心,如何还能安居在研究室内?”^[16]在国家与民族救亡图存的时期,顾先生难以“安居在研究室内”,他辗转北平、西北与西南三地组织开展研究活动,其本人亦曾亲赴绥远、西北等地进行考察。

顾颉刚与谭其骧在1934年创立《禹贡》半月刊,并随之将刊物研究的主旨“转到了以研究边疆历史和记录边疆现状为主”^[17]。卢沟桥事变后,顾先生在西北游历的过程中,发现回、汉、番之间充满隔阂,他就此写作了《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引起学界的广泛争论。费孝通就曾致信顾先生表示异议:“事实上中国境内不仅有五大民族,而且还有许多人数较少的民族。我在出国前调查过的广西大瑶山,就有瑶族,而瑶族里还分出各种瑶人。不称他们为民族,称他们为什么呢?”^[18]^[6]顾颉刚回应道:“我个人耕作的园地一向在高文典册之中,为什么这几年中要轶出原定的范围而注意到边疆问题,讨论这现实社会?讨论这‘民族’名词?这不是我的贪多务得,冒失从事,也不是我的忽发奇想,见异思迁,而完全处于时代的压迫和环境的引导……我想帝国主义者要达到他们瓜分我们土地的大欲望,提出这种分化我们的荒谬理论来……若不急急创立一种理论把这谬说挡住,竟让它渐渐深入民间,那么我们的国土和人民便会随处携贰了,数千年来受了多少痛苦而转合成功的民族便会随时毁灭了!”^[19]这种说法在民族学学理上看,存在商榷之处,但从“边政”之“政”的角度看,顾先生的提法体现了渴望各民族团结、共襄国家稳定繁荣的政治理想。多年以后,费孝通也对此解释:“我明白了顾先生是激于爱国热情……极力反对利用‘民族’来分裂我国的侵略行为。”^[18]^[6]而费孝通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体与多元原是辩证统一的概念”,也已经超越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思想。

顾颉刚在回复费孝通的文章中,提出学界需要“急急创立一种理论”,很大程度上就是指边政学的发展。顾先生在考察调研中,将边政学的理念运用到其中,在对西北地区教育与民族状况进行分析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顾先生“救亡图存”的理想让他进入广博的边政学研究活动中,使他的思考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在《中国边

疆问题及其对策》中，包括训练调查人才、发展交通、振兴实业、消减疾病、普及教育、公平交易、消除外国传教士影响、加强内地与边疆文化交流和通婚9项内容^[20]。顾先生令边政学成为真正能为实际问题提供对策的学问，赋予了边政学的社会实用价值。

马长寿先生作为一名完全在本土成长的学者，没有欧美留学的背景，他在运用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实际研究时，能摆脱其约束。例如，马先生在凉山彝族亲属制度的研究中有言：“著者在来四川考察之前，大体依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Notes and Queries on Anthropology’ 内之 Terms of Relationship，而损益之，为亲属称谓调查表，内包括称谓一百二十七项。又依东亚民族之特殊称谓，为亲属补编，内包括称谓九十七项。以此为考察四川亲属称谓之蓝本。及至罗彝民族时，觉其从表称谓殊为繁琐，于正表中又增十二项。共计称谓二百三十六项。”^[21]

1936年，马先生开始走出校园，前往四川、西藏等地进行实地的田野调查。到20世纪40年代末，马长寿先生的边政学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已经比较完善，形成了独有的边政学思想理论体系^[22]。《论统一与同化》^[23]一文，体现了其“统一”与“同化”的政治主旨思想与看法，“统一是中国治边的目标，同化是中国治边的方法。……所谓政治统一主要是全国各级政府，不论中原边疆，都需实行一种系统一贯，彻底民主的政治制度”，而“同化”则是“立几个标准或原则。合于此标准者保留它，宣扬它，然后发动民族文化运动，使中原的与边疆的民族都模仿它，宣扬它，至少使原有制度与之相辅而行，不可背道而驰”。“同化”的原则包括六点：进步的原则、民主的原则、适应的原则、理性的原则、轻重的原则和多数的原则。在主旨思想的指导下，他还进一步提出建设边疆的五种途径：边疆武力的国防化、边疆政治的民主化、边疆经济的现代化、边疆语文的国语化和边疆官吏的专业化^[23]。

可见，马先生的边政思想已经相当系统化，具有指导性、可操作性以及实用价值，推动了边政学的进一步繁荣。马先生自身的本土性，以及其学术研究的本土化趋势，证明“西学”进入中国后，本土的中国学者具有批判吸收“西学”成果与独

立创造理论体系的能力。有学者认为马长寿先生不同于“南派”或“北派”那些直接传承欧美理论的学者，是中国早期本土人类学、民族学家的代表。这些本土的学者能立足中国，超越学术的门户之见，创造性地利用西方理论与知识解释中国问题，为世界贡献中国的知识与经验^[24]。

民国政府的一些学者型官员，对于边政学的发展也作出了较大贡献，典型的有国民党元老戴季陶与边疆教育司司长凌纯声。戴季陶发起创立了“新亚细亚学会”，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拟定宣言中的“重边政，弘教化，以固国族而成统一”的政策，其主要内容是从边民选举、边地教育、边才任命、边疆建设等方面进行了立案，宗旨是“尽先为当地土著人民谋利益为前提”^[25]。戴季陶主张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边疆地区的纠纷。他与班禅大师关系密切，班禅大师三次到达南京，都是他负责接待。1934年，班禅大师回藏途中于玉树圆寂，戴季陶受命前往祭奠^{[25]67}。

凌纯声的相关研究，对于边政学发展的贡献也值得重视。作为教育方面的官员，凌纯声在任期间大力发展边疆教育事业，还提出了中国边政改革的构想。其探讨的核心问题是边疆政治建设问题，认为“有金山系的盟旗制、汉藏系的土司制、古亚与伊斯兰系的部落、蒙藏喇嘛教的政教制”，“各种制度在历史上自有其一定的任务，在今日或者仍有其存在的理由……但对于其中不合时代的部分，亦应随时加以改进，使整个政制可以现代化”，要使“边疆政治能够进步到符合民权主义的要求”，并提出“边疆政治民主化”的主张^[26]。

其他涉及边政学研究的学者，如徐益棠提出“文化先于政治”和边民为本的边政思想及其关于边疆建设与边政改良的构思^[27]，林耀华对民国时期康藏地区的田野调查与研究，柯象峰对西康地区民族社会情况的调查，李安宅对于“边疆性”问题的探讨，还有陶云逵、费孝通、胡耐安等众多学者提出的种种见解，在今天看来，都有开拓性与创造性，为当时边政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也为未来各相关学科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二）学术团体创知

1922年，莫尔思、叶长青等外国学者在华西协和大学创办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李安宅、方叔轩、徐益棠、冯汉骥等中国学者也参与其中。

学会主要研究中国西部地区的政治、人文、风俗、环境以及这四个因素对当地民众的影响,计划通过调查、出借设备、举行讲座、发表论文、出版刊物等方法来促进其研究^[28]。会刊《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刊登了学会研究的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研究范围不局限于人文领域,在自然科学方面也有大量成果。例如在生物与医学方面,李哲士《汉藏边疆金河地区地方性甲状腺病调查》、胡秀英《中国草药:土茯苓》、张奎《成都家蝇是肠道寄生虫之载体》都是当时之佳作^{[28]87}。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最为重要意义在于,有一批外国学者的研究让世界开始了解中国;而另一批中国学者则努力地将来自西方的理论与方法运用于中国的研究,摸索西方知识体系在中国的发展方式。

禹贡学会由顾颉刚、谭其骧等发起,1934年2月成立于北平,其最初的研究重点是中国地理沿革史,其在章程中明确提出:“本会以集合同志,研究中国地理沿革史为目的。”^[29]在国家与民族生存面临威胁时,学会开始将研究的重点转到边疆的史地研究上面,研究方法上其主张使用西方现代科学方法,“且岂但书籍为需用哉,举凡历史、地理、地质、生物诸学之知识亦莫不当有。”^{[17]205}转变研究重点后,学会在东北地区的史地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果,如张维华著《明代辽东卫所》、谭其骧著《辽史地理志补正》、张印堂著《中国东北四省的地理基础》等。学会还做了大量的边疆实地考察活动,创立了南洋研究专号、西北研究专号、河套水利调查专号等专项研究调查点,对当时的边疆治理提出了很多新思路与方法。例如对回族回教的研究,顾颉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的复兴,回教徒应有沉重的负担”,首要工作是使“非回教徒尽量知道回教中一切,从而激起彼此的同情心,造成合作的大事业”;“在文化方面做一些文化沟通工作,尤其注意汉人对于回人文化的了解。”(《禹贡》半月刊第7卷第4期附录)

中国边政学会完全是在国民政府支持下创办的,隶属于蒙藏委员会,1942年9月29日在重庆成立,吴忠信任理事长,其下设的理、监事会设总务、研究、出版三组,成员实际上是政府官员。学会依托此机构进行中国边疆研究,因此获得了

良好的资金支持^[30]。中国边政学会有较好的研究平台与条件,《边政公论》可以说是中国边政学会重要的创知渠道之一。《边政公论》在创办7年的时间里,对中国边疆进行了许多细致的调查与研究,其涉及地理、人文、经济、教育等方面,为当时国民政府的边疆治理提出了许多有建设性的指导性意见,体现出较强的政治功用性。正如其《发刊词》所言,“一切研究和学说,都应切合时局为最终的目标,方可产生伟大的效果。故我们对于边疆问题的研究也必须根据着学理和事实,同时根据着国策,以能与当前的边疆政治相配合。”^[31]

在同一时期,各类边疆学术团体开始涌现,学术活动兴盛一时,如斯坦因(Sir M. A. Stein)新疆考察团、斯文赫定(Sven Anders Hedin)西北科学考察团、史禄国教授(S. M. Shirokogoroff)的凉山民族考察团、中国科学社四川标本采集团、中央研究院贵州科学考察团,以及国民政府特组之西陲学术考察团等^{[6]205},都是当时比较著名的考察团队。其中既有中外合办的,也有中方或外方独办的学术调查团体;从学术团体的性质上,有官方、半官方以及非官方的。这些学术团体的调查与研究活动,推动了边政学的知识与理论创新。

20世纪20至40年代,中国边政学在20多年的时间里,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始至盛的快速发展过程,产生了数量众多且十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不过总体上看,这实际上也是当时各种条件作用下的一种偶然现象。一是在民国初年,西方知识体系、基础理论及方法系统地进入中国,“西学东渐”成为那个时代的主题,现代科学系统在中国开始发展起步,知识分子、学者们纷纷运用西方学科的方法重新解构与认识中国,中国成为西方人文社科研究的原材料地与试验田。二是民国时期,国家内忧外困,民心渴望强国复兴,研究“边政”与“救亡图存”相挂钩,自然获得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与支持。三是抗战时期南京国民政府西迁,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离开了汉文化传统的中原地区,“昔日的边区”反而成为当时的“中心”。国家治理的要求,也需要大家集中精力研究“新中心”的治理工作,尤其是临时首都所在的西南地区的治理工作。四是因抗战原因,大批学者以及大学为躲避战火,

迁往大后方西南地区，一时间，知识精英几乎全部汇集在西南地区，这自然也为边政学的发展兴盛创造了有利条件。

边政学本身就含“政”的部分，因此与政治是脱不了关系的。民国时期边政学的发展与国家政治状况紧密相连，很多学者及其调查团体都带着鲜明的政治目的从事边政学的研究，其所做的调查以及创造的知识大多能直接运用于实践之中，因而也产生了很多致用的成果。

三 边政学的应用与成果

在特定背景与条件下迅猛发展的边政学，产生了大量成果，相关专著、论文、调查报告等汗牛充栋。较强的应用性是边政学的特质之一，其很多相关的学术成果直接运用于政府治理，或于政府治理的过程中而产生，抑或是在政府治理与学术研究齐头并行的过程中产生。因此，研究边政学的应用与成果，实质上也就是研究边政学或边政学派的实践过程及其产生的结果。

（一）政治

边政学成果的应用，一部分原因是为了在法理上维护国家的完整与统一，对抗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的其他国家对中国进行的“理论上”的先导肢解，另一部分原因则是为了实现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有效控制。由于现代国家概念的出现，冲撞了中国古代模糊的疆域概念，国家边界与领土的问题集中爆发，因此，边政学在政治上的应用也产生了较大争论与影响。

从晚清开始，中国就开始不断地面临外部安全问题。20世纪初期，殖民主义发展到了顶峰，欧美国家与新兴的日本开始关注自己在华的利益，而清政府却没有很好扭转古代的疆域观，中国边疆不断地受到近代欧美国家与日本的挑战。由于近代国家几乎都是以单一民族构建，即民族国家，中国在当时还缺乏对这种理论的应对方法，在国与族的构建关系上缺乏相应的理论。根据民族国家的概念，欧美国家及日本自然而然地利用中国多民族的特质建立其在中国的代理人，或单纯地利用其理论改造中国。例如英俄以西藏作为势力缓冲区、日本建立伪满洲国等，都对中国的主权形成了威胁。在“大一统”思想下，学界开始以边政学为窗口，对抗“西学”从理论上分解中国，

并拉开了其中国化的序幕。

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成为了东亚地区的新霸主，以“征韩论”为对外方针的日本政府，开始在中国东北进行半殖民化统治。在此之前，日本学者对中国做了大量详细的研究，尤其是其“满蒙学”，已经占据学术话语的主导地位。冯家昇就曾心情复杂地说过：“凭日本人对于东北研究的业绩，也可以把东北取走了。假使国际联盟注重学术上研究的话，凭我们临时作的几种小册子，是要失败的，东北四省仍是要送掉的。”^[32]在清末民初，把日本学者撰著的“东洋史”或“支那史”编译为中国的历史教科书，曾成为一个时期的风气^[33]。因此，如《禹贡·发刊词》所言，当他们试图确认民族疆域之时，所遭遇的困难竟是来自日本的有关中国的言说，这些言说所创设的一些词语和概念，甚至渗入中国的“地理教科书上”作为“常识”广泛流布，这让《禹贡》学人们既感忧虑又深感耻辱^[34]。

作为话语的对抗，边政学的学术话语趋向于民族统一以维护国家完整。吴文藻就认为要进行民族通婚与同居，进行文化同化，以一个中华民族文化，造就一个现代化的民族国家^[35]；而顾颉刚则以《古史辨》为结论，提出“不但楚、越、商、周已混合得分不开，即五胡、辽、金诸族也无法在汉族里分析出去了”^[36]。这种理论是基于国家统一与团结的政治角度提出的，也是本土学者在当时主流西方科学理论影响下进行的理论创新，其价值和意义值得后人铭记。顾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对内蒙、西北等地的考察中，更加坚定了以“中华民族是一个”对抗潜隐的民族分裂与外敌入侵的想法。在顾先生的呼吁下，也确实产生了作用，如20世纪30年代那些西北回族军阀（马步芳、马鸿逵等），在受到顾先生有关“民族”观点的影响后，也都对自己的宣传用语（如“民族自决”）和政治立场进行了调整^[37]。

作为政治制度上的实践，边政学也开始探讨将现代的政党体制、法律制度、科层官僚体制等植入边疆地区。1929年国民党中央通令全国，废除道制，实行省、县二级制，云南省按照要求裁撤了北洋政府时期的蒙自、普洱、腾越三道，同时成立两殖边督办公署，加强边防事务，巩固了滇越边区的国防，促进了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38]。

其他事例如设立蒙藏委员会等专项机构,西康建省,并在康藏地区开展的国民党建设工作,以及成立湘西行政区等^[39]。

民国时期,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背景下,中国的边政学受到西方人类学、民族学对中国的影响,其主流思想是以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进行国族建构,并建立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但由于特殊的国情,西方的人类学、民族学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学理”上要解构中国。按丁骥的观点,“我不能不说明一点,我们今日所谈的边政,应该是非汉语人民的政治。”^[40]而一些非中原文化区的其他民族,其精英阶层努力阐述“同根同源”的思想,实际上是为了追求政治上的平等权力。如石启贵就用苗、汉两族在族源、语言歌曲、名称起源、医药、干支、姓名、宗教习俗等方面的一致性和相似性来论证“苗汉同源论”^[41]。石启贵在1936年任湖南省参议员,其后数度上书国民政府,促使国民大会在1946年增设“南方土著民族”代表十席^[42]。在今天看来,学者们从政治方面运用边政学,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是为了发挥其维护国家统一与完整的作用,但也因为同样的时代背景,边政学一些政治上的实践与学理上的探讨还不能继续完善与深入,很多问题也不便继续“辩论下去”。

(二) 经济

随着抗战的日益激烈,传统的中原文化区已基本沦陷,西部地区成为中国的大后方。为持续供给前线新鲜血液,坚守国家的最后屏障,国民政府开始大规模开发建设西南、西北等边疆地区,因此在经济层面上,边政学派也开始了相应的实践活动。

西南地区的经济建设自然成为了当时国民政府工作的重心之一。按照徐益棠关于边疆经济建设的观点,“开发边疆经济,当有两方面的看法:第一,当为国家着想,第二,当为边区人士着想。”^[43]国民政府因此制定了一系列开发西南边疆的经济政策,包括鼓励移民垦殖,改良西南边疆农业生产技术;发展西南边疆工业生产,建立西南边疆经济市场中心;改善西南边疆的交通运输,促进经济一体化;统一货币,发展西南边疆金融业等。其对西南地区的经济建设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44]。

至于西北地区,戴季陶认为其具有较大的开发

价值。“大家总以为西北是贫穷寒苦不过的地方,其实何尝如此,譬如新疆是无尽藏的财富之区,陕西、甘肃也是有将来开发不尽的财富……现在就西北的出产品而言,陕西出产麦子、棉花,甘肃也可以变为棉田。”^[45]戴季陶三次前往西北地区考察,提出“欲救西北首须振兴农林事业,尤以造就大量农林人才为根本要图”^[46]。1932年,第一次考察回南京后,他与于右任、焦易堂、张继昌发起创办了农林专科学校,其目的就是为了造就大量农林人才,振兴农林事业,改变西北“天老地荒”“飞沙走石”的现状。1934年戴季陶再次赴西安考察,他先后抵达西安、兰州和西宁等地,并赴陕西武功,参加了由他操办的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的奠基典礼^[47]。戴季陶制定的西北地区的经济开发政策,包括发展交通、发展实业、兴修水利、植树造林等措施^[48]。

随着边疆建设的不断深入,边疆人民的思想观念也随之发生改变,并进而开始改变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湘川公路建设过程中,大批工程人员随着路线规划深入苗寨,尽管他们不见得就使苗族人民的生活方式与汉人的一致,但其对当地苗族人民的生活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42]77}。据当地老人回忆,“公路完工后,路很宽,有车子过来,很多人都来看名堂。从前没人见过车,觉得车子像大象一样,眼睛很大,四方四面摇晃的像个房子,两边还有像格子一样的花纹,很好看。”^[49]当现代化的工业产品一瞬间就出现在了当地人的家门口,传统的生产方式、习俗甚至社会关系,都必将发生一定的变化。

从传统的学术观出发,学者要“读圣贤书”,就不可以过多地关注实践,特别是涉及创造经济效益方面的实践,被认为会影响学术研究的纯洁性。民国时期,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边政学能被学者们应用到社会各个方面的实践中,而不会受到太多的诘责。边政学在经济方面的研究成果,有相当一部分被国民政府采纳,应用于边疆的经济建设之中,并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 文化与教育

民国时期边政学在文化与科教方面的应用,包括调查边疆地区的其他非汉民族,认识其文化与中原传统文化的差异,建立互信,设立边政学系,以及在边疆地区进行教育建设等。

边政学的学术成果在这一时期内广泛地被民众所了解与接受，是由于边政学在文化上的实践与应用。以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 1937 年的“海南岛黎族考察团”为例，考察团由陈序经先生发起，杨成志、王兴瑞等学者参与，对海南岛黎族进行了长达 4 个多月的田野调查^{[50][118]}。为了使社会普通民众能够了解黎族、苗族人民的实际生活，杨成志团长还与当时的三星电影社总经理霍盈之先生签订合同，由该社派出摄影师邝伯鹑随考察团拍摄电影^{[50][119]}。考察结束后，考察团成员不仅撰写了多篇论文与多部专著，更加重要的是推广了海南岛黎族、苗族的独特民族文化，在社会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考察团不仅收集到了黎族人和苗族人民日常生活、生活和进行宗教活动使用的多种物品，拍摄到了数百张照片，随团同行的三星电影社摄影师邝伯鹑先生还拍摄了反映黎族人、苗族人民生活各个方面的影片，该影片后来被命名为《到五指山去》，在广州中华戏院放映^{[50][122]}。当时，还有 1 名黎族男子和 4 名雕面纹身的黎族女子随行前往广州，参观中山大学并表演唱歌，“各位教授同学前往观看者甚众”^[51]。

边政学在教育方面的应用，也成为当时国民政府解决一系列实际问题的重要手段。边疆教育司司长凌纯声在去台湾前做了一系列的发展边疆教育的工作，包括督导蒙旗学校复员，编译蒙藏维教材读物，改善边疆学校员生待遇，增扩边疆地区学校等^[52]。戴季陶建立西北农业专科学校，以及东北大学的建立，都可视为重要的边政学教育实践成果。更有意义的是，1944 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国立中央大学和国立西北大学设边政学系，其标志着边政学正式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一门学科。由蒙藏委员会力推，边政学获得国民政府的批准与认可，专门从事培养边政人才及开展相关研究工作^[53]。

在国家陷入内外部都不稳定的情况下兴起的边政学，其发展也受到“开国门”以及“西学”中国化、抗战迁都西南等特定因素影响。抗战结束后，边政学迅速“衰退”，既有国家不再受到外部危机的困扰等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内在的学科内容与范畴过于宽泛等学理方面的原因。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

教育学、地理学等学科实现了对边政学的拆分，并各自继承了部分边政学的内容。回顾历史，边政学派“创知与致用”的基本学术理念，以及该学派的学者注重实地考察、田野调查的精神，仍然值得今日学者思考与借鉴。

参考文献：

- [1] 段金生. 中国近代边疆民族研究的方法与理论 [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175.
- [2] 吴文藻. 边政学发凡 [J]. 边政公论，1942(5/6)：266.
- [3] 贾湖亭. 论我国半世纪以来之边疆政策 [M]. 台北：边疆论文集，1966：675.
- [4] 马长寿. 十年来边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J]. 边疆通讯，1947(4)：1.
- [5] 刘晓光. 《边政公论》研究 [D]. 昆明：云南大学人文学院，2011：8.
- [6] 杨天宏. “边政”何以成“学”：读汪洪亮著《民国时期的边政与边政学》[J]. 社会科学研究，2014(4).
- [7] 边疆研究会成立大会 [J]. 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28(9)：7.
- [8] 汪洪亮. 抗战时期边政学的兴起及其“学科性”[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35(6)：214.
- [9] 符雪红. 20 世纪中国边政研究与边区开发理论述评 [J]. 学术探索，2004(9)：116.
- [10] 王铭铭. 东南与西南：寻找“学术区”之间的纽带 [J]. 社会学研究，2008，23(4)：39-40.
- [11] 王利平，张原，汤芸，等. 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边疆和边政研究：李绍明先生访谈录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30(12)：34-41.
- [12] 张寿祺. 第一次民族调查 [N]. 羊城晚报，2002-11-02(10).
- [13] 刘小云. 20 世纪前半期杨成志西南民族研究述论 [J]. 学术探索，2008(5).
- [14] 徐平. 社会学中国化的奠基人吴文藻 [J]. 群言，2017(6)：35.
- [15] 杨成志. 杨成志人类学民族学文集 [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551.
- [16] 郑良树. 顾颉刚学术年谱简编 [M].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149.
- [17] 顾潮. 顾颉刚年谱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 [18] 费孝通. 顾颉刚先生百年祭 [J]. 读书，1993(11).
- [19] 顾颉刚. 我为什么要写“中华民族是一个”[N]. 益世报，1939-05-10(20).
- [20] 李冀宁，赵堃. 顾颉刚先生边政思想与实践 [J].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39(3)：56.
- [21] 马长寿. 凉山罗彝考察报告 [M]. 成都：巴蜀书社，2006：264-265.

- [22] 王欣. 马长寿先生的边政研究[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08, 18(3): 128-137.
- [23] 马长寿. 论统一与同化[J]. 边政公论, 1947(2): 9-16.
- [24] 王欣. 马长寿先生早期民族学研究的知识结构 with 学术旨趣: 兼论 20 世纪 30—40 年代中国民族学本土化研究范式[J]. 民族研究, 2016(2): 55-65.
- [25] 侯艳兴. 戴季陶边政思想与实践述评[J]. 新余高专学报, 2004, 9(1).
- [26] 凌纯声. 中国边疆文化[J]. 边政公论, 1942: 9-10.
- [27] 汪洪亮, 钟荣帆. 文化先行与边民为本: 徐益棠边政思想述论[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41(4): 64-72.
- [28] 周蜀蓉.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之再诠释[J]. 中华文化论坛, 2010(3): 82-89.
- [29] 朱慈恩.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边疆研究学术团体的兴起及其意义[J].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08, 28(1): 33.
- [30] 耿宪文. 时局与边政: 《边政公论》研究(1941—1948)[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11: 11-13.
- [31] 佚名. 发刊词[J]. 边政公论, 1941(1): 1.
- [32] 冯家昇. 我的研究东北史地的计划[J]. 禹贡, 1934(10): 2-5.
- [33] 李孝迁. 清季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介译初探[J]. 史学月刊, 2003(9): 102-103.
- [34] 王中忱. 民族意识与学术生产: 试论《禹贡》派学人的“疆域”史观与日本的“满蒙”言说[J]. 社会科学战线, 2014(10): 232.
- [35] 杨清媚. “燕京学派”的知识社会学思想及其应用: 围绕吴文藻、费孝通、李安宅展开的比较研究[J]. 社会, 2015, 35(4): 113.
- [36] 顾颉刚.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顾颉刚卷[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533.
- [37] 马戎. 如何认识“民族”和“中华民族”: 回顾 1939 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 32(5): 11.
- [38] 杨明辉. 近代云南边政建设及边政机构设治研究[J].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8(1): 148-149.
- [39] 罗维庆, 罗中. 湘西行政区划的沿革与整合[J]. 民族论坛, 2008(4): 6-7.
- [40] 丁骥. 边政更张的一种看法[J]. 边政公论, 1948(3): 28.
- [41] 张秋东. “文化猎奇”与“政治自觉”: 凌纯声等与石启贵的湘西苗族研究比较分析[J].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0, 25(3): 109.
- [42] 赵树冈. 边地、边民与边界的型构: 从清代湖南苗疆到民国湘西苗族[J]. 民族研究, 2018(1).
- [43] 徐益棠. 边疆经济之相对的发展[J]. 边政公论 1944(6): 1.
- [44] 赵超. 南京国民政府治理西南边疆的经济政策及其局限[J]. 经济问题探索, 2017(2): 64.
- [45] 戴季陶. 西北[M]. 新亚细亚学会, 1931: 6-7.
- [46] 戴季陶. 开发西北工作之起点·西北[J]. 新亚细亚学会, 1933: 87.
- [47] 沈云龙. 戴季陶(传贤)先生编年传记[M]. 台湾: 文海出版社, 1985: 161.
- [48] 沙文涛. 戴季陶西北开发思想述论[J]. 兰州学刊, 2012(7): 42-46.
- [49] 尚晴. 国家建设与民族整合: 以 1930 年代湘川公路为例[J]. 民族论坛, 2017(1): 43.
- [50] 王献军. 民国时期的“海南岛黎苗考察团”[J].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 34(5).
- [51] 文科研究所. 海南岛黎苗民俗品及摄影展览会讯[N]. 国立中山大学日报, 1937-07-01(1).
- [52] 娄贵品. 论凌纯声的边政改革主张与边疆建设贡献[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41(4): 52-53.
- [53] 娄贵品. 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 近代中国国立大学设置边政学系的考察: 从吴文藻《边政学发凡》说起[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19, 29(1): 189.

责任编辑: 黄声波